

# 石鼓—我國的國寶

那志良 (本文作者曾任文化大學藝研所所長，現任師大美研所教授)



▲石鼓

石鼓，共有十個，每個的重量，近乎一噸，在唐朝的時候出土的。出土的地點是陝西省，鳳翔府的天興縣南二十多里的田野中。

石鼓之形，只能說有一點像鼓，頂部圓凸，下部平直，四週刻文字。出土之後，並沒有受到十分注意，韓文公曾建議把它們搬到太學裡去，都沒有辦到。後來才由鄭餘慶把它們搬到鳳翔的孔廟。

從此，人們漸漸地知道了它們的重要性，它們實是考古學、文字學、文學、史學上極珍貴的重要資料，載籍中最先著錄的，是唐人蘇勗所著的「叙記」，以後著錄的日益增多，韋應物、韓愈等人還做了「石鼓歌」，研究的人對它們非常有興趣。這裡，我把石鼓的定名、時代，沿革、摹拓，分四段簡述如下：





## (一)定名

「石鼓」這個名稱，是在出土之後，大家看它們有些像鼓，隨便的就叫它做石鼓，而不是研究決定的名稱。大家叫慣了，也就成爲它們的定名了，事實上，它們與鼓制是不合的。

清乾隆時，曾找來石匠，用青金石做製了十個，他不模倣原器之形，而根據石鼓之名，取用現在蒙皮木鼓之形製做，上下還雕出鼓釘來，把鼓文刻在蒙皮的面上，故宮博物院已故院長馬衡先生指摘這事說：

「最可笑者，莫過於清高宗之重摹石鼓。夫既曰重摹，必依其形制矣，而彼則不然，其形類今之鼓，冒革施釘，無不畢肖，其文又不在四周，而在頂上，苟不幸而原石亡，則後之人，且將據清鼓以證原石，前人所謂武事刻於鉦鼓者，將爲不刊之論矣，其貽誤後人，不已甚耶？」

這個錯誤，與錯誤的定名不無關係，大家認爲石鼓之名，實在有改正之必要。

替它改名的人不少，我們舉幾個例子如下：

1. 唐人蘇勗、竇蒙，認爲銘文中所述多漁獵之事，主張稱之爲「獵碣」。

2. 李賢注漢書竇憲傳：「方者謂之碑，圓者謂之碣」石鼓形狀略呈圓形，上小下大，頂圓底平，認爲如果叫它做碣比較相近。

3. 郭宗昌認爲不應叫「石鼓」，應當叫「石古」。

4. 馬衡氏認爲這十石，與琅琊台刻石及禪國山刻石等之制相同，應名之爲「秦刻石」。

近來學者多主張用「刻石」之名，一般談到它時，仍多用「石鼓」這個俗名。

## (二)時代

馬衡氏主張用「秦刻石」之名，是他認爲這些刻石，是製作在秦代。以前的人，大多認爲是周代之作，甚至有直接稱之爲「周宣王石鼓」的。對於它的時代，是有不少說法的：

一、歐陽修集古錄等書，認爲是周文王時物。

二、董道廣川書跋等，認爲是周成王時物。

三、蘇勗叙記等一百一十餘家，認爲是周宣王時物。

四、鞏豐等主張是秦前期物，鄭樵等主張是秦後期物，都沒有那一位王。

五、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等認爲是秦襄公時物。

六、震鈞石鼓文集注等，認爲是秦文公時物。

七、馬衡等認爲是秦穆公時物。

八、唐蘭等認爲是秦靈公時物。拙著石鼓通考也認爲是靈公時物。

九、清武億著金石一跋，認爲是漢時物。

十、俞正燮癸巳類稿等，認爲是元魏世祖時物。

十一、金馬定國石鼓攷論等，認爲是宇文周時物。

這些意見，自然都有所根據，本文限於篇幅，不能一一敘述，這裡只把我們的意見，認爲是秦靈公時的理由申述如下。

各家的意見雖然不同，而參証的根據，不外：一、字體，二、字形，三、作時，四、詩句，五、所在地，我們也按照這五項，簡述如下：

一、我們既認爲它是秦時物，而以上意見，尚有秦襄公、秦文公、秦穆公、及秦靈公四說，我們應當在此四公之中，說出爲什麼是靈公而不是其他三公的理由。

二、根據「字體」而言，四公都有可能：理由是：

1. 石鼓字體，字畫無三代醇古之氣。

2. 字類小篆而較繁複，似宗周





彝器之文而較整齊者，為史籀篇之文。石鼓是屬於這一系的。

3. 史籀十五篇之文字，獨行於秦。

三、根據「字形」而言，只有秦靈公可能。理由是：

1. 下列幾個字，是秦器獨有之例：  
毆 春秋以前的銅器裡，沒有見過這個字。  
丞 僅見於秦權。  
宣 石鼓文的「宣」字，當中从「曰」，與秦會稽刻石之一宣字同。  
避 秦景公時代的秦公鐘，還用「朕」，石鼓文用「避」。

2. 以上這幾個字，不獨是寫法僅見於秦器，又都是見於秦後期之器，石鼓的時代，應是秦後期。

四、根據「作時」而言，文公與靈公都有可能。理由是：

1. 根據史記秦本記，秦代所作的「時」，共有五個，是：

- 秦襄公作西時，
- 秦文公作鄭時，
- 秦宣公作密時，
- 秦靈公作吳陽上時及下時。

2. 石鼓出於天興縣三時原，是現在的鳳翔縣。所謂三時原之地。秦襄公的西時，不在雍邑；密時作於渭南，不在三時原上，如果立時

與石鼓有關的話，石鼓之作，僅是文公與靈公有可能了。

五、從「詩句」而言，文公、穆公、靈公，是都有可能的。理由是：

1. 石鼓之文與侍車攻吉日之詩，詞意略同，前人因此多誤為周宣王之作。
2. 秦人居周舊地，經過了相當時間，接受了周的文化，才有這樣的詩出現。到文公十三年，才「初有史以紀事」，可能是初使用文字，在這萌芽期中，不可能有那樣長的詩句。

可知石鼓之作，必在秦文公以後，那麼，文公、穆公、靈公都有

可能。

六、從「所在地」而言，穆公、靈公都有可能，理由是：

1. 石鼓的出土地點，是在雍城，而不在岐陽。秦國以雍為首都，是從德公元年，到孝公十二年。石鼓這樣的重器，立在國都，是很近情理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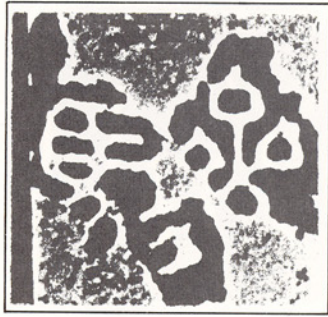
2. 石鼓之作，從最廣泛來講，是在德公與孝公之間。上述四公中，在這年限之中的，只有穆公與靈公了。

根據以上所述，能夠在五項中都有可能的，只是靈公，所以我們認為石鼓之作，是在秦靈公時候。



▲ 石鼓





### (三)沿革

石鼓在唐時，出土在陝西鳳翔之後，鄭餘慶把這十個鼓搬到了鳳翔的孔廟裡，就一直擺在那裡。

五代之亂，這十鼓散失了。宋時司馬他知鳳翔的時候，才又把它們找回來。不過，他找回來的十個鼓，九個是原名，一個是偽作的，誰偽造出這個鼓來？現在已是無可考了。

宋皇祐四年（一〇五二），向傳師看到這偽鼓的文字，與其他幾九鼓不同，認定那是一件偽器，又到民間搜尋，居然把真的找到了，可是已然被人鋸去上部，並把下部剔成白形了。它雖已缺損，終是原物，就把它運回來，換掉那件偽器，恢復了十鼓之數，這個石就是「作原」石，如圖。

作原石被人鋸去一節後，每行字數僅存四個字了，斷續不能成文。向傳師得到此石，非常高興，他曾把鋸去的一段，又用石補起，使它恢復原狀，在這補上去的石上，還利用這塊地方，刻上尋獲事由。這塊補上去的石，不知何時，又被人剔去，所以現在的「作原石」，仍然是白的形狀。

到北宋崇寧，大觀年間（一一〇二～一一一〇），石鼓由鳳翔運到汴京，就是現在的開封，先放在

辟雍，後又換到禁中保和殿。

石鼓在開封時，傳說有把字口裡填金的事，目的有二：一是表示重視，二是杜絕摹拓。馬衡氏據石的情況研究，填金是不可能的事。

金人陷京師，把石鼓搬到北平去了。石鼓北徙，傳聞頗多，例如：

1. 金人入汴，剔取其金而棄去之（陳繼儒眉公書畫史）。

2. 濟河遇風，棄之中流（都元敬金薤琳瑯引王順伯的話）。

3. 金人得汴梁，奇玩悉輦至燕京，移者初不知此鼓為何物，但見其以金塗字，必貴物也。亦在北徙之列。（道園學古錄）

4. 金人入汴，剔取其金而棄去之，至元乃輦至京師，置于國學廟門之下（同第二項）。

金人雖把石鼓北運，但並不珍視，存留在王宣撫宅中，宅後就是大興府學。

元成宗大德（一二九七～一三〇六）末年，虞集做大都教授，在泥土草萊之中，得到了石鼓，把它們洗刷之後，用大車十輛，把它們運到國子學大城門外，在石壁下各五石，下面用磚砌成座子，周圍又把它們圈起來，使人可以看而不能撫摸。這是根據道園學古錄的記載。

潘迪石鼓文音訓，記其遷入文廟的時日，是元仁宗皇慶二年（一三一三）。

石鼓存在國子監（唐代國子監中設國子學）數百年，沒有移動過。

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一）九月十八日，日人在我國東北，發動九一八事變，北平距東北比較近，政府恐怕一旦發生戰事，有作戰場的可能，故宮博物院就準備把文物南遷，以求安全。那時石鼓屬於北平市政府保管，也想把它們運走，就和故宮博物院商量，請故宮代裝、代運，並暫交故宮博物院保管。

石鼓的裝箱比較麻煩，第一，它們的重量太大；第二，石皮已與石心分離，敲起來有彭彭之聲，在運輸之中，一有搖動，石皮便會震裂下來，又要損失許多文字。

我們的辦法，是：買來「高麗紙」，把它沁濕，貼在石鼓外面，用棉花壓緊，使紙陷入字口及石的凹下之處，使分離的石皮，又復靠緊石心，不易脫下，即有脫下，仍有粘回去的希望。

在紙的外面，用厚棉被包裹；棉被之外，再用粗麻，打成辮子，緊緊纏上，做一厚木板箱，把它裝進去，上下四周，塞緊棉花稻草，使它一絲不能搖動。

每一個鼓，都這樣做。實在是盡了保護之責了。





民國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）三月十五日，故宮博物院第二批文物南運時，石鼓也隨著這批文物，到達了上海。

民國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）十一月，故宮博物院南京庫房興建完成，石鼓隨著故宮文物一同運京。

抗戰期間，故宮博物院文物向後方疏散，院長馬衡先生特下手令，告訴經辦搶運的人員，必須把石鼓搶運離京。這十個石鼓，被搶運到浦口，裝上火車，經津浦運到徐州，轉隴海線，運到了陝西、寶鷄，存放在城內文廟。

以後又用汽車向後方移運，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）四月運到了漢中城內文廟，同年十月運到成都東門內大慈寺；二十八年（一九三九）六月，運到峨眉東門外大佛寺，三十一年（一九四二）十月，又改運西門外武廟。

石鼓存在峨眉山下，歷時七年有餘。武廟的西廡，正收存放這十個石鼓，寬餘的地方，截成一間小屋，由我居住，與石鼓為鄰，數年之久。

抗戰勝利之後，在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）十月，運到了重慶，與散在各處的文物，共同集中在重慶南岸海棠溪。

民國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）五月三十一日，這十個石鼓，裝上了

十輛卡車，踏上了還都的行程。原來的計劃，打算循川湘公路，經沅陵、長沙、南昌等地，直接運京，可是這一條路，正在修理，極難行車，到了南昌以後，才知道南昌至南京一段，不但路基沒有修復，多處橋樑，還沒有著手興建，不能通行，只好改運九江，由招商局的執信輪運京，已是七月二十六日了，共走了約兩個月。

文物遷運台灣之時，石鼓沒有運來，聽說已被運回北平了。

石鼓歷代遷運路線，見圖。

#### (四)摹拓

十個石鼓，都有文字刻在四

周，鼓文的大意，簡略記在下面：

避車石 叙出獵時情景。

汧毆石 稱道測源之美與遊魚之樂。

田車石 叙獵之方盛。

鑾車石 叙獵之將罷。

灑雨石 追叙初由測源出發攻戎救周事。

作原石 叙作西時時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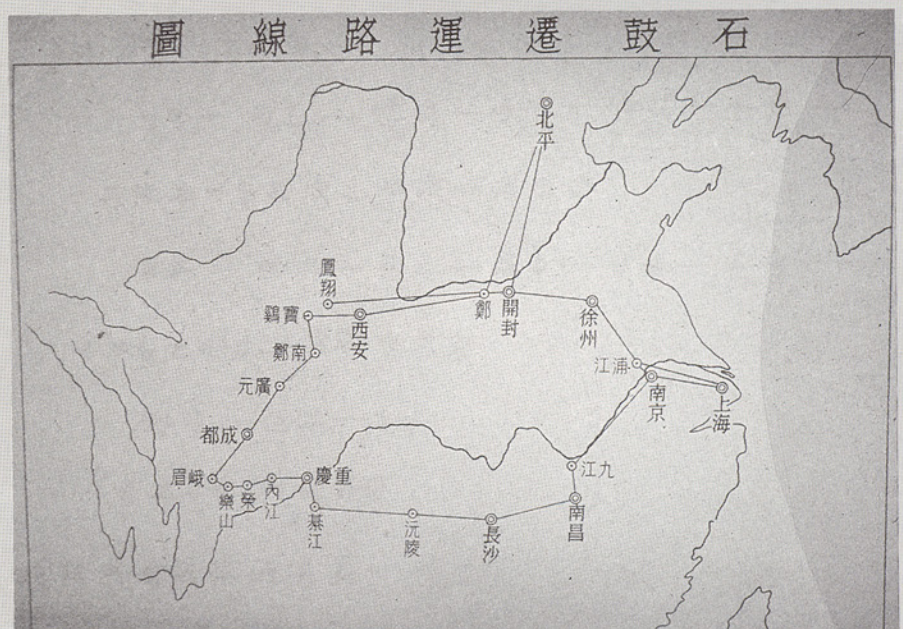
而師石 追叙凱旋時事。

馬薦石 叙罷獵而歸時，途中所遇之情景。

避水石 叙作時既成，將改遊以行樂。

吳人石 叙獵罷獻祭於時。

這十石上的字，歐陽文忠公所



▲ 石鼓歷代遷運路線





見，有四百六十五字，潘迪作石鼓文音訓時，就僅有三八六字，明清著錄多是三一〇字左右。這都是因為遷運、傳拓的關係，使石皮脫落了。所以石鼓文的拓本，愈早愈受人重視，宋拓本最爲人所爭取的。

明人安國最喜歡收購石鼓文拓本，他得有十本極好的拓本，把他的齋名就叫「十鼓齋」。這十本，以三本的存字最多，是：

中權本 宋大觀（一一〇七～一一一〇）初年所拓，存五〇〇字。上海藝苑珍賞社有印本。

後勁本 宋大觀前或元豐、元祐間（一〇七八～一〇九三）所拓，存四九七字。上海中華書局有影印本。

先鋒本 宋皇祐中（一〇四九～一〇五三）所拓，存四八〇字。郭沫若著石鼓文研究中附印此本。拙著石鼓通考也附印此本，並據中權、後勁兩本，把此本所缺的字補入。

安氏對所藏拓本極爲珍視，又知道兒女輩對此，並無興趣，深恐自己故後，被兒女丟棄或出售，想辦法使這些寶物，永留安家。最後他想出一個辦法，把這三本重要的拓本，放在一個匣內，牢牢封固，放在天香堂的樑上，下面有天花板遮著，不會有人知道，這樣，這些拓片永不會落於他人之手。不料他



▲石鼓文

的兒子，把家財揮霍完了，就把天香堂出賣了，人家來拆房子的時

候，被人拆去了。這三本拓本現在日本人手中。